

[宋] 陆游 著
蒋方 校注



入蜀记校注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HUBEI PEOPLE'S PRESS

入蜀记校注



责任编辑：祝祚钦

封面设计：汪 汉

ISBN 7-216-04247-6



9 787216 042475 >

ISBN 7-216-04247-6

I·378 定价：20.00 元



入蜀记校注

[宋] 陆游 著
蒋 方 校注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HUBEI PEOPLE'S PRESS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入蜀记校注/(宋)陆游著.蒋方校注.一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
2004.12

ISBN 7—216—04247—6

- I. 入…
II. ①陆…②蒋…
III. 游记—中国—南宋
IV. I264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4171 号

入蜀记校注 (宋)陆游 著
蒋方 校注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数:140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8.75
插页:2

版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7—216—04247—6/I·378

印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20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前言

陆游，南宋著名的诗人，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，创作数量大，而且成就高，当时便与杨万里、范成大、尤袤有“四大家”之称，而位居首位。陆游的诗作洋溢着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，千百年后，依然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。最为人所熟悉的自然是他的《示儿》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在撒手人寰的流连之际，面对拥围床榻的亲人，该有多少儿女情长的眷恋，该有多少家长里短的叮咛，该有多少对生命不再的哀伤，而陆游的唯一牵挂只是祖国疆域尚未统一，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诗句脱口而出。人去天国，心系热土，殷殷期待，谆谆嘱托，这是何等深刻的爱国情感！人们不禁要问，这样的一种深铭骨髓的爱国激情源自何处呢？那么，读一读陆游的《入蜀记》吧。读《入蜀记》，不仅能换一个角度来体察陆游的爱国情感，更能使我们理解他的爱国情感是植根于祖国的山川河流，一草一木，植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，在这里，其感情之宽广，之深厚，之博大，丝丝缕缕，细致入微，可感可触。如果说，陆游的诗是他情感涌动的瞬间记录，而《入蜀记》这部日记体的游记之作则记

录了陆游人生中的一段历程，在一定的时空里展现一位爱国志士的步履行迹和心理感应。

《入蜀记》文笔简洁而优雅，无论在中国游记史上还是中国日记史上，都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。它表明，陆游不但是—位杰出的诗人，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者。

《入蜀记》写在陆游的仕宦人生的一个低谷时段。

陆游(1125—1210)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他的祖父陆佃，是北宋著名的学者，曾从王安石问学，著有《埤雅》、《春秋后传》、《陶山集》等，官至尚书右丞。他的父亲陆宰，北宋末，官转运副使，南渡后，力主收复而受到秦桧之流的压抑，多在投闲置散之地。陆游少年即能诗文，以门荫补登仕郎。此后他曾二度赴临安应试而不第，直到三十四岁时方被授予福州宁德县主簿一职，正式进入仕途。任职期满，他以举荐入京，担任敕令所删定官，迁大理寺司直，兼宗正簿。

绍兴三十二年(1162)六月，高宗禅位于太子赵昀，是为孝宗，次年改元隆兴。孝宗颇为赏识陆游的才华，赐给他进士出身，迁官枢密院编修，兼圣政所检讨官。

这是陆游一生仕宦中最为畅快的时期，他怀抱抗金恢复的政治志向，热情地投入到朝廷政事之中。他参预国家机密文件的起草，参与高宗朝政事诏令的编撰，颇受信任。他曾上书议政，请除积弊，增强国力；他曾蒙诏入对，面请北征，“泪溅龙床”；他曾代拟论事札子，分析抗金大计的利弊。他有诗回忆此时情景：“往时草檄喻西域，飒飒声动中书堂。（自注：余尝草丞相鲁公以下与夏国主书于政事堂。）”（《醉后草书歌诗戏作》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但也正是在他仕途顺利、心情愉快之时，风波骤然而起。隆兴元年（1163），孝宗宠用龙大渊与曾觌，引起一些正直的朝士的不满，陆游也参与批评论，而惹恼孝宗，遂在五月被免去枢密院编修官之职，出为镇江通判。

隆兴二年（1164）三月，张浚视师淮上，到镇江。张浚与陆游的父亲相识，与陆游有世家之谊。他赏识陆游的才华，在政治上又声气相投，在镇江时，陆游前往拜谒，顾遇甚厚。陆游因与他的儿子张栻，幕僚陈俊卿、冯方、查籥等结识，往来密切。张浚是孝宗朝中力主用兵的大将。张栻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，曾向孝宗慷慨陈辞：“继今以往，誓不言和，专务自强，虽折不挠，迟以岁月，何功之不济哉！”陈俊卿等同为有志向有才干的实战派人士而为张浚收至幕下。因此，尽管此时的陆

游正遭遇排斥，却可以想见，在统领军事的张浚的麾下，在前沿之地的镇江，能与这些才志之士结识相聚，对于志在抗金复兴的陆游，一定是很大的鼓舞。他在晚年时回忆起这段交往，充满了怀念之情。但是，龙大渊等借张浚在外，在孝宗面前诋毁张浚。四月，张浚奉召还朝，即被罢去相职，出判福州，同年八月在忧郁中去世。张浚的罢职与去世，对于期待实现报国志向的陆游，无疑是一个打击。

乾道元年(1165)七月，陆游改任通判隆兴府军事，遂由镇江往赴南昌。此时隆兴府长官是陈之茂。他当年主持锁厅考试时，不顾秦桧的旨意而擢陆游为第一，居于秦桧之孙秦埙之上，曾触怒秦桧，于陆游有师门之恩。陆游的调任南昌，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是因为他的从兄陆沅时为提举两浙市舶，镇江在其辖区之内，陆游循例应当回避，而隆兴通判毛钦望与安抚使陈之茂“职事不协”，故相调换。看起来，这应当是一次正常的调动，而能与陈之茂共事相处也应有愉快之感，但在陆游上给陈之茂的谒见文书中却流露出了对当政者的许多怨意，因此，调任的背后其实有着朝廷中权势斗争的影响，恐怕与陆游反对龙大渊、曾觌的用事不无关联，其中也有他与张浚交往密切的原因。实际上，在到达南昌的第二年，陆游即因“交结台谏，

鼓唱是非，力说张浚用兵”的罪名被罢去官职，证实了看似正常调动背后的人事险恶。于是，陆游回到故乡山阴闲居。

这一次仕途的浮沉起落，深深地挫伤了陆游的政治进取心，却也使他对官场的复杂、朝政的淆乱充满愤慨与忧虑，而对于兴复中原的事业，心怀渴望与焦灼。孝宗乾道五年（1169）的十二月六日，他接到朝廷的差遣通报：以左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事。在此之前，主战抗金的王炎以参知政事出任四川宣抚使，六月上表，请依前任虞允文之例辟置僚属，获准后，便邀请陆游加入幕府。此时陆游已在山阴闲居了三年有余，王炎所去，又是抗金的西北前线，能获得辟请，受到重视，总是令人高兴的。而面对这两项差使，陆游自然以服从朝命为先。于是，他一面以《谢王宣抚启》向王炎致谢，一面又写了《通判夔州谢政府启》，接受差命，准备前往夔州。夔州治所，在今四川省奉节县，距山阴有千里之遥。陆游此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，携家眷作长途之行，要筹措旅费，要准备行资，而他本人此时又值久病初愈，经不起长途跋涉的劳顿，遂决定于第二年的夏天启行。

赴任夔州，在当时，是陆游的一个重大决定。他以病弱之身而作江上的长程之行，路途的艰辛可以想见，何况还要携带家眷，身有照应之责。他退居山阴，家有

田园，生活虽不宽裕，却也不愁衣食，而作全家的长途旅行，要雇船，要备粮，这笔资费非借贷无从着落。而求贷并非易行之事。面对种种艰难而最终作出决断，也许正是此前的仕宦经历促动了陆游的选择：夔州虽遥远，却也远离了朝廷·官宦的纷争；夔州虽僻陋，却风俗淳朴，民心可爱；夔州地近西北抗金前线，待他友好的王炎正在那里主政；凡此种种考虑，使他下定决心，靠向亲友借贷而凑足旅费，携带着弱妻幼小，不辞蜀道之难，不惧千里迢迢，远赴夔州通判的微职。因此，赴任夔州，在陆游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事件，故而自出发的当晚，他便开始了日记的写作。这写作，不仅是为了记录下长途旅程之中的所见所想，写作本身也成为这位政治上的漂泊者在孤独状态中的伴侣。

乾道六年(1170)闰五月十八日，陆游告别送行的亲友，携带家小，从故乡出发，沿着运河，一路舟行，经萧山，入临安，过秀州(今浙江嘉兴)、吴江(今江苏吴江)、常州(今江苏常州)、丹阳(今江苏丹阳)，抵镇江，由此进入长江航道，其时已是六月底。进入长江以后，乘舟逆水而上，陆游携带家人，沿途停靠，补给生活，也游览山水名胜，访问故人，而风雨辛苦，不止一端，到十月二十七日方抵达夔州。这近乎半年的行程，他都以日记的形式，或繁或简，一天不落地作了记载，遂成《入蜀记》六卷。

陆游在《入蜀记》中，逐日记载了由山阴到夔州的所经之地，所历之事，所观之景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与思考。就所记事物而言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：自然景观，历史遗迹，民情风俗，人事交际。作为游记，前三类是其主要笔墨所在。游记记游，人在其中，总会有所抒发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，而记什么，怎样记，却是以客观的姿态来展现写作者的潜在意识，更能体现作者的个性。陆游《入蜀记》在近乎半年的行程记载之中，无论所经，还是所想；他都是以学者的态度，历史的眼光，从文化积淀的角度，来审视自然山水与人文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。在他的审美感受中，传达了一种鲜明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取向，使山水的游赏、风物的观览与历史的思考、诗情的共鸣结合起来，从而与他的抗金志向、爱国热情融为一体。

从山阴到夔州，陆游乘船，经运河，入长江，一路西行，以船为家，虽然辛苦又生活不便，却有徜徉于山水的快乐，沿途景色，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的笔下。就《入蜀记》的记载看，每每在动心悦情之际，他便会联想起前人描画此地景物的诗句。于是，他的思绪与情感也就由此而飘向历史的时空，或赞叹前人诗句描画之

工，或评说诸种诗句之最妙，或感慨今日始得领略前人诗中之境。当其吟哦之际，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再是纯然的、孤立的外在，而成为人所共赏的佳致，情景交会，古今相通，人对山川景物的热爱之情也就油然而生。如，他至长芦，观“江面渺弥无际”，便想起李白的诗句：“维舟至长芦，目送烟云高”；过牛渚，见江面窄狭，微风浪作，便想起刘禹锡的诗句：“芦苇晚风起，秋江鳞甲生”；胸怀骤然开阔。夜坐观月，见“影入溪中，摇荡如玉塔”，便感慨“始知东坡‘玉塔卧微澜’之句为妙也”；登鄂州（今武昌）石城山，西望汉阳，便想起李白的诗：“谁道此水广，狭如一匹练。江夏黄鹤楼，青山汉阳县。大语犹可闻，故人难可见。”感叹“形容最妙”；知音会赏，一时而神游千载。当溯流而无风，舟行缓慢，人未免心急，陆游写道：“是日风静，舟行颇迟，又秋深潦缩，故得尽见老杜所谓‘幸有舟楫迟，得尽所历妙’也。”因此而陶醉于诗情画意之中。有时观赏远方景物，一想到前人曾经亲近，他就生出深深的遗憾：“远山嶄然，临大江者，即铜官山，太白所谓‘我爱铜官乐，千年未拟还’是也，恨不一到。”有时面对景物，他会想起许多相关的诗句，想起那些曾经到过此地的诗人，通过形象的描写，通过诗句的吟诵，他与前人在此景色中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交会。如他过西塞山时的情景：

晚过道士矶，石壁数百尺，色正青，了无窍穴，而竹树迸根，交错其上，苍翠可爱，自过小孤，临江峰嶂无出其右。矶一名西塞山，即玄真子《渔父辞》所谓“西塞山前白鹭飞”者。李太白《送弟之江东》云：“西塞当中路，南风欲进船。”必在荆楚作，故有中路之句。张文潜云：“危矶插江生，石色擘青玉。”殆为此山写真。

检《入蜀记》中描写山水景色而引前辈诗句达一百一十六次之多，所及诗人有李白、杜甫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等近二十人，数量颇为可观。面对自然造化的奇功，追忆前人的诗句，陆游在表达自己对山水的赞赏之情的同时，又由自然而进入历史，进入文学；而使他的赞赏赢得一种支持的力量，使他对自然山水的陶醉获得一种心灵的快慰。在他的赞赏中，山水胜景是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内涵的。唯其如此，才格外美。

《入蜀记》逐日记载船行所经之地，有城镇，有乡村，有名胜，而激动陆游的思绪与联想的，往往是一些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地点。这些相关的历史事件，一为远事，即六朝隋唐之事；一为近史，即北宋之事。而无论近史还是远事，又多涉战乱，透出一种沧桑之感。这样的联想取向，显然包含了陆游对南宋国势的关切。

从临安沿运河西行，从镇江入长江西上，沿途经过之地，既是六朝故地，又是南唐旧土，也是南宋退守江

南的江防，最能唤起陆游的历史感慨与现实思考。如过奔牛闸，他便想到刘宋时沈怀明筑垒抗击孔觊之事，于是写到：“闸水湍激，有声甚壮。”如过牛渚，他便想到隋平陈、北宋灭南唐，都是由此地过江而成就大业，而此地江面狭，“微风辄浪作不可行”。读这些文字，可以想见陆游立在船头，迎面江风，眺望两岸而遥想当年，可以感受到他思绪起伏的胸涛。又如，过皖口，望皖山，他便想到南唐李璟失淮南之地而迁都豫章时，过皖口有“悲愤歔歔”之事；过沌口，他便想到西晋末年的战乱中，北方人士的王澄弃荆州而走，而荆州人郭舒则留屯沌口；梁陈嬗替之际，王琳奉梁而不肯附陈霸先，侯安都率军从建康而上，讨王琳至沌口，“皆此地也”；语意十分沉重。陆游著有《南唐书》，熟悉这一段史事，而且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认识，因此《入蜀记》在提到南唐君主时多批评其昏庸无能，而对六朝政权的短期更迭，陆游则更多一些白云苍狗的悲凉感。故在经由沿途地点之时，在往事的叙述之中，他表达了一种兴衰嬗变的历史思考。如船过丹阳，运河两岸土堤高耸，他写到：“自京口抵钱塘，梁陈以前不通漕，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，皆阔十丈，夹冈如连山，盖当时所积之土。朝廷所以能驻蹕钱塘，以有此渠也。”如在池州，他写到：“初王师平南唐，命曹彬分兵自荆州顺流东下，以樊若冰为

乡导，首克池州，然后能取芜湖、当涂，驻军采石，而浮桥成。则池州今实要地，不可不备也。”这些思考在经过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这一六朝旧都、江东要地之时，就直接表达为对南宋政治形势的分析，甚至军事上的建议。在《入蜀记》中陆游写到，至金陵前，船“过龙湾，浪涌如山，望石头山不甚高，然峭立江中，缭绕如垣墙。”遂发议论说：“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，故江左有变，必先固守石头，真控扼要地也”。当登石头山，“西望宣化渡及历阳诸山”，不禁感慨：“真形胜之地，若异时定都建康，则石头当仍为关要”。又进一步分析说：“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，石头虽守无益，盖未之思也。惟城既南徙，秦淮乃横贯城中，六朝立栅断航之类，缓急不可复施。然大江天险，都城临之，金汤之势，比六朝为胜，岂必依淮为固邪？”陆游的这些议论虽是身临其地，触景而发，却并不是就历史说历史，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在高宗绍兴年间，南宋朝廷之上有过关于定都钱塘还是迁都建康的争论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坚持以临安为都，理由多多，实以其地近海，便于逃跑躲避，而主战者，先有宗泽，后有张浚、陈亮，都力主要图谋恢复中原，就当定都关中，若不能，就当以建康为都。尽管高宗以苟安求免，驻在临安，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

风,但这一争议并未终止,一直持续到孝宗即位之后。张浚曾慷慨激昂地陈说:“东南形势,莫如建康,人主居之,可以北望中原,常怀愤惕。至如钱塘,僻在一隅,易于安肆,不足以号召北方。”(《宋史》卷三六一)陆游的主张自然同于张浚等人。他在任枢密院编修时,写有《上二府论都邑札子》,论述以建康为都城的重要性。在文章中,他举孙吴、萧梁、南唐为例,谓其偏居江南,也曾有不以建康为都之时,然而,“其当时为计,必以建康距江不远,故求深固之地。然皆成而复毁,居而复徙,甚者遂至于败亡。”他说:“天造地设,山川形势,有不可易者也。车驾驻蹕临安,出于权宜,本非定都,以形势则不固,以馈饷则不便,海道逼近,凜然常有意外之忧。”故希望朝廷以“建康、临安,皆系驻蹕之地”,而若可接受,他愿进一步呈说定都措置的意见。由于临安作为都城已是事实,陆游在陈说意见时,为使朝廷重臣认识建康地位的重要,采取了两都同设并存的办法,而他的实质意见仍是以建康为重。在写作《入蜀记》之时,陆游早被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,在历任镇江通判、隆兴通判之后,他被任命的仍然是一通判之职,而且要远赴夔州,是那样一个荒僻穷陋的地方。但是,就是在这样的地位上,当船过建康,当身临石头,陆游仍然情不可止地要评论历史,评说形势,一如其

诗中所说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。当船过池州，陆游又写到：“州唐置，南唐尝为康化军节度，今省。又尝割青阳隶建康，今复故。惟所置铜陵、东流二县及改秋浦为贵池，今因之。盖南唐都金陵，故当涂、芜湖、铜陵、繁昌、广德、青阳并江宁、上元、溧阳、溧水、句容凡十一县，皆隶畿内。今建康为行都，而才有江宁等五邑，有司所当议也。”又从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上作探讨，希望加强建康江防之地的实力。

在《入蜀记》中，陆游所经过的自然景观也好，历史遗迹也好，本是物化形态的存在，而经由他的评赏，化为了有血有肉的情感寄寓。沿途景致，优先进入他的眼眶的，是与历史文化相关联者，他的评赏方式，又是从历史中搜检史事或诗句，这就使他在山水游历之时的观赏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认同方式。他以一个学者的知识来讲述这些地方的过去，以一个诗人的才情来赞美这些景致的特色，又以自己的发现去认同前人的美感，以自己的感受去体察前人的经历。在他的观赏中，眼前景致不再是一幅幅平面的图画，而具有了历史的纵深之维，让人透过当下的宁静而感受此地曾经发生的变幻风云。在他的观赏中，他不再是一位孤独的远行者，他通过景物的存在而获得了与前人的交流与感应。陆游在游历中的这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，不仅在